

皖南事变后中共反击 国民党顽固派方针的确定

刘以顺

1941年1月，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，以7个师8万余人的重兵，对奉命北移的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约9000多人进行围歼，致使新四军将士除2000余人突围外，其余大部分壮烈牺牲或被俘。国共两党团结抗战的局面出现了严重危机，几乎陷于破裂。事变发生后，由于中共中央对国民党顽固派采取了政治上取全面攻势、军事上取守势的正确方针，结果既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，又维持了国共两党团结抗战的局面。中共中央在当时错综复杂的形势下，怎样确定这一方针的呢，本文拟略加探究。

皖南事变发生时，面对新四军将士被国民党重兵包围、即将被歼的危险情况，中共中央毛泽东、朱德、王稼祥和华中局刘少奇、陈毅及南方局周恩来、叶剑英等人均十分焦急不安。他们频繁通电，商讨对策。最初商定的方针是政治上、军事上立即准备大举反攻。这是集中了党内意见后作出的。1月12日，刘少奇和陈毅向毛泽东等建议：“望你们速向重庆严重交涉，停止包围，请让我安全北移。请朱、陈、罗①准备包围沈鸿烈，我们准备包围韩德勤，以与国民党交换。是否有当，请毛、朱、王立复，并直告朱、陈、罗执行。”②毛泽东、朱德、王稼祥同意刘少奇、陈毅的意见，次日，电示在重庆的周恩来、叶剑英，要他们“向

① 朱、陈、罗，指朱瑞、陈光、罗荣桓。

② 刘少奇、陈毅关于在苏鲁发动军事攻势向毛泽东等的建议（1941年1月12日）。

当局提出最严重交涉，如不立即解围，我们即刻出兵增助，破裂之责由彼方担负。”^①同时，毛泽东、朱德、王稼祥还向党内发出了关于在苏、鲁发动军事攻势以答复皖南事变的指示。其中说：

“同意刘少奇、陈毅12日意见，苏北准备包围韩德勤，山东准备包围沈鸿烈，限十天内准备完毕，待命攻击。山东由朱、陈、罗负责，苏北由刘、陈负责。”“如皖南部队被蒋介石消灭，我应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韩德勤、沈鸿烈，彻底解决华中问题。”

“为应付严重事变，华北准备机动部队应加紧。”^②毛泽东等人不仅考虑到在山东、苏北反击国民党顽固派，很快还考虑到在全国进行反击，因此，在同日晚些时候通报刘少奇、陈毅：“我们已向当局提出最严重之抗议”，“我全国政治上、军事上立即准备大举反攻”。^③

1月14日，国民党顽固派围歼皖南新四军的阴谋得逞。中共中央悲愤不已，立即重申关于政治上军事上准备作全面大反攻的方针。同日，毛泽东、朱德、王稼祥向党内指示：“中央决定在政治上军事上迅即准备作全面大反攻，救援新四军，粉碎反共高潮。”“除已令苏北、山东迅即准备一切，待命消灭韩德勤、沈鸿烈，同时发出最严重抗议通电，并向蒋介石直接谈判外，我华北各部须遵前令，提前准备机动部队，准备对付最严重事变。”^④1月15日，毛泽东致电周恩来、叶剑英，对实行这一方针的必要性作了说明：“蒋介石一切仁义道德都是鬼话，千万不要置信。”“中央决定发动政治上的全面反攻，军事上准备一切必要力量粉碎其进攻……只有猛烈坚决的全面反攻，方能打退蒋介石

① 毛泽东、朱德、王稼祥关于应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重交涉致周恩来、叶剑英电（1941年1月13日）。

② 毛泽东、朱德、王稼祥关于在苏鲁发动军事攻势以答复皖南事变的指示（1941年1月13日）。

③ 毛泽东、朱德、王稼祥关于皖南事变中我之对策给刘少奇、陈毅的通报（1941年1月13日）。

④ 毛泽东、朱德、王稼祥关于政治上军事上准备反攻的指示（1941年1月14日）。

的挑衅与进攻，必须不怕决裂，猛烈反击之。”^①

但是，时过不久，中共中央即改变了上述方针，于1月25日正式确定了对国民党顽固派“政治上取全面攻势，军事上取守势”^②的方针。

中共中央之所以改变原定方针，而确定政治上采取全面攻势，军事上取守势的方针，是基于以下两方面的原因：

一、认真听取了党内同志的意见和建议。

当中共中央采纳了刘少奇和陈毅的最初意见，决定在政治上、军事上立即准备大举反攻后，党内同志继续考虑妥善的对策。

1月15日刘少奇向毛泽东等提出了主要应从政治上进行反攻的新建议。他开门见山地说：“中央决定在政治上、军事上准备作全面的大反攻，这里的同志于义愤之余，亦有立即举行反攻之主张，然根据各方面情况，平心静气一想，我们却有下列意见，望中央细心考虑。”

首先，刘少奇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和军事反攻的不利因素，认为：（一）全国局面，国民党未投降，仍继续抗战，对共产党仍不敢分裂，且怕影响对苏联的关系。在此时，我党亦不宜借皖南事件与国民党分裂。（二）目前华中我占领地区很大，兵力不够，仍不能巩固。皖东北敌伪匪猖獗，已全部成游击区，原来巩固地区均已丧失，淮海区亦不能支持，盐阜区土匪亦蜂起，黄桥已被敌占，海安亦有被敌占领可能。我们部队尚须休整补充。故从华中来看，能在半年、一年之内不发生大的战斗，肃清土匪，巩固现有地区，对我有利。（三）韩德勤现正利用水网，加筑工事，深沟高垒，屯集粮食。故我彻底消灭韩部甚为困难，即打开一、二个堡垒，消灭其一、二次增援队，问题仍不能彻底解决。

① 毛泽东关于政治上、军事上准备全面反攻致周恩来、叶剑英电（1941年1月15日）。

② 中共中央关于对付蒋介石“一·一七”命令的方针给周恩来的指示（1941年1月25日）。

接着，刘少奇根据上述情况提议，以在全国主要从政治上实行全面大反攻，但在军事上除个别地区外，暂时不实行反攻为妥。实行全面军事反攻，对我不利，无胜利把握，且有极大危险。

最后，刘少奇提出目前中共对皖南事变态度及办法应为：（一）向国民党提出严重抗议，并发宣言提出释放叶挺及所有被俘人员、赔偿所有损失及抚恤死伤等条件。（二）宣布在皖南事件未彻底解决前，华中我军决不再考虑北移之命令。（三）在全国全世界实行大的政治反攻，宣传抗议皖南事件，揭破国民党分裂行为，以孤立顽固派。刘少奇强调指出：“如此我在政治上有利，在军事上稳健，可能使蒋、何在半年至一年内，不敢再向我华中进攻，使我能巩固华中阵地，以待变化。”^①

为了使中共中央全面地了解情况，正确地估计形势，周恩来在重庆也密切地注视着皖南事变以后苏联、英美外交人员和记者的反应，注视着国内各阶层和海外侨胞的反应以及大后方人民群众、中间派和国民党内部不同派系的态度，及时将情况报告中共中央，并提出自己的看法，供中共中央决策时参考。1月19日，周恩来和董必武、叶剑英署名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书记处发了一份长电，对于当时形势和国共关系作了分析，指出：国民党蒋介石是“抗战下的剿共”，我们是“抗战下的反攻”。他们向中共中央提出了“政治上全面进攻”，“军事上局部反攻”的建议。关于如何实行政治上的全面进攻，^②（一）广宣传茂林阴谋，编印各种材料在国内外发表；（二）以各地八路军新四军将领名义发表通电，反抗军委命令，要求恢复新四军，释放叶挺，退还官兵人枪器材，控告顾祝同、上官云相，要求严惩肇事将领，并声明不论行与否，决在原地坚持抗战，不受任何乱命；（三）八路军将领发表通电，一方面声援新四军，一方面坚持抗战，保卫西北，要求发饷发弹，保护交通，抗议撤销桂林办事处；（四）建

^① 刘少奇关于主要应从政治上进行反攻问题向毛泽东等的建议（1941年1月1日）。

议延安发表广播谈话印发各地。

刘少奇、周恩来等人的意见和建议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，对中共中央制定正确的方针提供了重要参考。

二、吸取了共产国际指示中的意见。

皖南事变后，中共中央曾把当初决定的政治上进攻、军事上也是进攻的方针向共产国际报告，并请其给以指示。共产国际不同意中共中央采取同蒋介石尖锐对立的政策。1941年1月20日，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来电，要求中国党严格注意把握党的政策。不久，季米特洛夫再度来电，提醒中共中央不可主动破裂国共关系，不可另起炉灶，而应将斗争矛头指向亲日派。^①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，那时还很尊重共产国际的意见。因此，毛泽东收到季米特洛夫的电报之后，便部署全党在政治上取猛烈攻势，而在军事上暂时取守势。^②中共中央这次对共产国际指示所以表示同意，与前述当时中共党内意见都倾向于政治上取攻势、军事上取守势的认识也是有关的。因此可以说，中共中央在皖南事变后确定政治上取攻势、军事上取守势的方针是兼听了共产国际和党内同志意见的结果。

中国共产党按照政治上取全面攻势、军事上取守势的方针，很快取得了主动地位，不仅彻底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，而且维持了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，直至抗日战争取得胜利。通过这场斗争，中共在国际国内的政治地位大大提高，而国民党的地位却大大下降。实践证明，当时中共中央关于政治上取全面攻势，军事上取守势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，而这一方针的确定是中共领导层集中了集体智慧的结果。

（作者单位：中共安徽省委党校）

^① 杨云若、杨奎松：《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88年6月版，第521页。

^② 毛泽东关于蒋介石发布“一·一七”命令后国共关系的变化及我之对策致周恩来、彭德怀、刘少奇电（1941年1月20日）。